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倪润安

2019年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成果丰硕，总量达到350篇（部）以上，研究格局呈现出新趋势。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仍然是本时段最主要的内容，曹魏墓葬、南朝墓葬砖画、唐墓壁画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亮点。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方面，新公布的资料不多，但数十年的积累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尤其在北魏洛阳城的复原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手工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处于萎缩状态，乏善可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保持平稳发展。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墓志与碑刻研究在本年度表现突出，成果所占比例较高。这两个方面均有多种专业期刊或集刊作为平台，为成果及时而充分地发表创造了良好条件。以敦煌学为标杆，近年来云冈学又整装奋起，未来石窟和造像研究的成果将会更多。以墓志、碑刻为主的出土文献研究，除了考古学者整理汇编新资料之外，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十分重视，从多种角度考释和深入探索碑志的信息，相关成果蔚为大观。

一 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都城

本年度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所涉有中原地区的邺城、洛阳城、长安城，以及边疆地区的渤海上京城。

邺城方面，沈丽华探讨了曹魏邺城的都城空间与葬地分布，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布局关系（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洛阳城方面，陈建军、余冰从汉魏洛阳宫太极殿遗址的考古资料入手，探讨历朝太极殿的建筑形制、发展变化及“三朝五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洛阳考古》第1期）。钱国祥结合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外郭城、宫城形制和重要建筑布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复原研究（《华夏考古》第4期、第6期，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0~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宫城核心区南部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第一次明确了应天门遗址的分期与形制，确定了永泰门的位置和形制（《考古》第1期）。韩建华讨论了唐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认为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革唐代周而做的礼仪准备（《中原文物》第6期）。

长安城方面，何岁利运用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唐大明宫“三朝五门”空间布局，认为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大明宫内部以三道宫墙为框架，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和内朝三朝区域格局，是唐代对传统“三朝五门”礼制的新诠释；

尤其是含元殿外朝空间的创立，突破了周、汉、魏、晋、北周以及隋代以来外朝在门址等非宫殿场所举行的传统，开创了三殿对应三朝的新体制，并为后世历朝所效仿（《考古》第5期）。罗瑾歆从门道、平面布局两方面对唐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的形制做初步探索，推断该门应为一门三道的城门，并认为承天门是第一座明确以组合建筑形式出现的城门，创建了一种以飞廊连接城门墩台、朵楼和双阙的城门范式，也是第一座真正实现三出阙的城门（《考古》第12期）。曲安京、陈懿文复原了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模型，认为圜丘蕴含了一个三圆三方的宇宙模型，可能未按照隋代的方案设计建造（《考古》第8期）。

边疆地区都城方面，刘晓东对渤海上京城北垣外侧8、9号寺庙址始建年代作了补充论证，认为宋玉彬关于这两座寺庙址始建年代的新说是可信的，即其始建年代为大钦茂以上京为都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

徐龙国对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模式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论述，认为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中原文物》第1期）。

（二）地方城市

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各类遗迹445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遗物。其中“郭家台城址”的兴建、增修、废弃年代与历史文献记载可相印证，其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尤其是砖构、石构城门和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为汉晋城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考古》第7期）。

2013~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东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分为五期，其中第三期为东汉中期至蜀汉，第四期为蜀汉末至东晋早期，第五期为东晋晚期至南朝中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2017）》，科学出版社）。

1998~2000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早、晚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晚期遗存被命名为“凤林文化”，年代在魏晋十六国时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林城：1998~2000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孙永刚等对晋阳古城二号建筑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系统的植物种子采样与浮选，区分出农作物种子8种，非农作物种子中以藜的数量最多，此研究有利于深入认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的生业方式（《考古与文物》第6期）。

汪勃、王小迎对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和主要道路等形制布局略作探讨，推测隋江都宫及东城基本沿袭了南北朝时期广陵城的范围及其主要道路网（《东南文化》第4期）。汪勃还介绍了扬州唐罗城的城墙和城壕、中轴线、城内格局以及相关运河概况，探讨了隋唐时期淮南运河扬州唐罗城段之位置，认为扬州唐罗城四至范围和中轴线与隋唐及其以前开凿的运河有关，扬州唐罗城的形成与其周边水系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2期）。

朱忠华对南诏城出土的纪年有字瓦进行梳理，推断纪年的具体年代，并探讨相关城址的修建年代、历史沿革及结构布局，认为唐开元二十七年至大历十四年（739~779年）是南诏筑城的高峰期（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



（三）其他遗址

1997~199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是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可分为六期，其中第五期遗存属于高句丽中期文化遗存，年代为魏晋时期；万发拨子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的发现及其与该遗址高句丽时期墓葬的传承关系，对研究高句丽墓葬的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金牛区席草田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为隋至唐初，第三期为晚唐五代时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2017）》，科学出版社）。

魏坚、孟燕云在调查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北魏长城的起止位置、分布走向、长度以及在北魏军事防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认为北魏修筑的北部长城防线是随着其国力的增强而不断北移的，逐渐形成了以六镇与长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文物》第7期）。张文平依据《魏书》的记载，认为六镇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镇城，并结合考古资料对沃野镇、怀朔镇的建置进行了考证（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

2011~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勘探和发掘，其中6号仓窖形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应为隋唐时期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建设和储粮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依据（《华夏考古》第4期）。刘婷以含嘉仓、回洛仓和黎阳仓为重点，兼及集津仓和盐仓，探讨隋唐时期漕仓的选址、平面布局、储粮方式及其变化（《中原文物》第1期）。王炬、吕劲松、赵晓军依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资料，对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设立诸粮仓的原因和分布特点、仓窖的形制规模等进行探讨（《洛阳考古》第2期）。

二 墓葬发现与研究

（一）墓葬发现

1.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

2015年，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焦作市博爱县上期城村发掘一座曹魏墓葬，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整理了这座墓的资料（《中原文物》第2期）。

200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在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大唐庄村发掘一座西晋砖室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村发掘一座西晋墓，出有鲜卑特征的陶罐（《北京文博文丛》第4期）。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上街区清理三座西晋中晚期墓葬（《文物》第12期）。2013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洛龙区龙门大道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墓葬（C7M6238）（《洛阳考古》第1期）。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长安区东祝村发掘两座西晋墓（《文物世界》第3期）。2015~2016年，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市博物馆在江苏邳州陈滩村煎药庙西晋墓地清理砖室墓葬九座，应是西晋时期下邳国的一处家族墓地（《考古学报》第2期）。

201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清理墓葬91座,其中纪年墓11座,整个墓群年代范围为西晋至五凉时期(《文物》第9期)。2015~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佛爷庙湾一新店台墓群保护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Ⅲ区出土西晋十六国墓葬50座(《文博》第5期)。

1978年、1980年,朝阳县文化馆文物队在辽宁朝阳县腰而营子村大姚金沟砖厂取土场内,先后各抢救性发掘一座十六国前燕时期鲜卑墓;现由朝阳市龙城区文物管理所、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整理这两座墓的资料(《北方文物》第4期)。

197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镇石头村发掘一座北魏墓,大同市博物馆对该墓及大同城西其他几座北魏墓葬的出土器物做了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2002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二电厂二期改扩建工程中发掘北魏墓葬27座(《文物》第8期)。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龙盛小学清理北魏永安元年(528年)曹连墓,出土一具四神、孝子图画像石棺(司马国红、顾雪军编著:《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科学出版社)。2012年,偃师市文物旅游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新寨工业园区发掘两座北魏墓葬,其中一座纪年为正光元年(520年)(《中原文物》第6期)。201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在西安市灞桥区江村发掘北魏墓葬10座,应是北魏略阳郡阿阳县王氏家族墓地(《文博》第1期)。

2014~201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改造区发掘205座东汉至明清时期墓葬,其中M66为东魏元象二年(539年)韩显度墓(《考古》第9期)。2014~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在西安长安区郭庄村发掘一座西魏墓葬,墓主为吐谷浑暉华公主与茹茹将军乞伏孝达(《考古与文物》第4期)。200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对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墓室遍布彩绘壁画,是山西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基本完整的北齐墓葬壁画之一(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太原北齐刘贵墓遭到毁坏,后收缴回部分墓葬遗物和1合墓志,墓主卒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华夏考古》第6期)。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发掘了北周拓拔迪及夫人宇文宣华墓,合葬于北周建德六年(577年)(《中原文物》第3期)。

2. 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墓葬

2008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郟阳博物馆在湖北郟县李营墓地发掘7座东汉到三国时期墓葬,其中M2出土曹魏甘露二年纪年砖(《江汉考古》第2期)。2016~2018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三国孙吴早期墓葬M1为砖室墓,平面呈十字形结构,封土规模较大,是孙吴时期的重要墓葬(《东南文化》第6期)。

2013年,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抢救性发掘两座西晋墓,均出土“太康五年九月三日”模印铭文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宁区博物馆整理了这批资料(《东南文化》第4期)。

2015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襄阳市柿庄村抢救性发掘墓葬27座,其中M1为东晋纪年砖室墓,出土10余块纪年铭文砖,铭文为“泰元廿一年韩墓”(《考古》第1期)。



2011年,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在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抢救性发掘5座砖室墓,为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其中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罗健夫妇墓、元嘉三十年(453年)罗道训墓是刘宋纪年墓葬的重要发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整理了这批墓葬资料(《文物》第10期)。2015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襄阳市柿庄发掘一座南朝画像砖墓,规模较大,判断其年代为萧梁时期(《文物》第8期)。2018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福建平潭县仙女山墓M1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年代应为南朝晚期至唐初,填补了平潭地区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的空白(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2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2011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先后在湖北省巴东县焦家湾、五里堆古墓群共发掘六朝砖室墓6座(《四川文物》第4期)。2013~2014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在重庆市丰都县马鞍山墓群抢救性发掘六朝墓葬4座(《文物》第6期)。2014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润州区清理11座六朝墓葬和1座窑址(《东南文化》第2期)。2014~2015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市邢江区梅岭村魏庄组发掘六朝墓葬19座(《江汉考古》第6期)。2016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天隆寺复建工程地块清理5座六朝砖室墓(《东南文化》第2期)。2016年,韶关市博物馆在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一个建筑工地抢救性发掘3座东晋南朝时期的砖室墓(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2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科学出版社)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第七部考古报告集,集中公布了一批六朝墓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01年在重庆市丰都县袁家岩遗址发掘两晋南朝墓葬9座;2002年,又在袁家岩遗址发掘两晋墓葬2座。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00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地嘴墓地发掘六朝墓葬9座。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万州区文物管理所2001年在重庆市万州区梁上墓群发掘蜀汉至南朝墓葬3座;2002年又在万州区银家嘴墓群发掘蜀汉至南朝墓葬3座。山东省博物馆2002年在重庆市万州区瓦子坪遗址发掘南朝墓葬3座;2003年,又在瓦子坪遗址发掘六朝墓葬7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镇江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2002年在重庆市云阳县石家包墓群发掘南朝墓葬4座。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奉节县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奉节县三塘崖墓群发掘蜀汉墓葬5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益阳市文物管理处、万州区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坪墓群发掘六朝墓葬13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丰都县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丰都县槽房沟墓地发掘蜀汉两晋墓葬5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2003年在重庆市奉节县合同溪墓群发掘南朝墓葬6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湾墓群发掘六朝墓葬5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万州区博物馆2003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屠户湾墓群发掘六朝墓葬4座。西安半坡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云阳县新河村崖墓群发掘两晋崖墓5座。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忠县文物管理所2003年在重庆市忠县土地岩崖墓群发掘南朝崖墓4座。

3. 隋唐五代时期墓葬

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房山区鱼儿沟村发掘隋代墓葬3座,出有“开皇十八年”铭文纪年砖(《北京文博》第3期)。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北发掘一批战国晚期至

明代的墓葬，其中130号唐墓随葬陶俑保存较为完好，应为唐高宗时期墓葬（《文博》第2期）。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庄村抢救性清理唐代宰相韩休墓，该墓壁画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尤其是墓室西壁树下高士图、东壁乐舞图和北壁东侧山水图（《文物》第1期）。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韦曲街道清理4座墓葬，其中M3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吴兴郡夫人沈和墓（《文物》第7期）。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兰家小学清理2座唐墓（《考古与文物》第2期）。201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二工区A5段（西安市高楼村西侧）清理一批墓葬，其中ⅣM9年代在盛唐时期（《考古与文物》第6期）；ⅢM76年代为8世纪中叶前后，ⅢM75年代为中晚唐时期，ⅣM32年代在8世纪前半叶后段略偏晚（《洛阳考古》第1期）；ⅢM14、ⅢM56、ⅢM58、ⅢM63的年代为盛唐至中晚唐时期（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西部考古》第18辑，科学出版社）。同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还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三工区C1段（西安市东小寨村西北）清理一座唐代单室土洞墓C1-M12（《华夏考古》第3期）。2006年，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站发掘3座唐墓（《考古与文物》第1期）。2017~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新建高新区小学抢救性发掘唐代早期墓葬1座（《文博》第2期）。

2006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洛阳南郊花园村北郑西高铁洛阳龙门站项目工程范围内发掘两座唐代纪年墓，分别是开元三年（715年）豆卢灵昭之妻芮国夫人杨氏墓，元和十二年（817年）豆卢灵昭之孙豆卢鸮墓（《考古》第7期）。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城以南清理唐景龙二年（708年）李敬彝墓（《华夏考古》第3期）。1995年，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南巩义二纸厂抢救性清理两座唐墓，其中M1出土墓龙、地吞、观风鸟这三种在河南极其罕见的神煞器；许昌市博物馆、巩义市博物馆整理发表了此墓的资料（《中原文物》第3期）。2015年，南乐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南南乐县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施工过程中抢救性清理了晚唐天复元年（901年）苏绪夫妇墓（《中原文物》第4期）。

2012年，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发掘一批唐代墓葬，其中M19为天授二年（691年）库延安夫妇合葬墓（《文物》第5期）。2012年，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玫瑰家园小区（二期）发掘唐墓4座（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市滨河地产工地发掘唐上元三年（676年）隋龛墓（《北方文物》第2期）。

2016~201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辛安屯村发掘唐开成二年（837年）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考古》第2期）。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清理唐代墓葬3座（《北京文博文丛》第4期）。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石景山首钢园区东南区发掘一座晚唐圆形墓葬（《北京文博文丛》第4期）。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北省平山县平山镇王母村发掘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太原郡霍公夫人博陵崔氏墓，该墓壁画特别是山水画保存完好，是晚唐中小型壁画墓的重要发现（《文物》第6期）。2018年，蔚县博物馆在河北



省蔚县涌泉庄乡西陈家涧村抢救性清理一座晚唐圆形砖室墓，出土的绿釉塔形罐与凤首壶组合具有地方特色（《文物春秋》第5期）。2015年、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对河北省黄骅市郑家口村和齐家务镇发现的古墓葬分别进行抢救性发掘，郑家口墓葬为两座南北排列的唐代墓葬，齐家务墓葬为三座东汉晚期至隋唐时期的砖室墓（《文物春秋》第6期）。

1987年，太原第一热电厂扩建施工中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由于施工破坏，墓葬形制不详，仅出土青瓷器残件；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这批青瓷器，修复后共43件，包括俑、镇墓兽和动物，推测该墓葬年代为唐高宗时期（《文物》第8期）。2014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发掘唐代墓葬3座，其中2座墓葬为开元四年（716年）赫连山墓、开元九年（721年）赫连简墓，两墓内均发现“树下人物”屏风壁画以及保存基本完整的棺床壁画（《文物》第5期）。

2000~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重庆市云阳县余家包遗址发掘唐墓7座。200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云阳县文物管理所在重庆市云阳县马沱墓地发掘唐墓5座（以上二文均见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科学出版社）。2017年，常德博物馆在湖南常德市武陵区南坪社区发掘3座唐墓，其中一座为唐咸通九年（868年）王师简第九女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动物园工地清理砖室墓4座，其中M1出土有陶生肖俑，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年代应为唐代初期（《考古》第6期）。

2015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蜀冈村发掘南唐升元元年（937年）田氏墓（《文物》第5期）。2017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省成都市海滨村年家院子区域发掘两座五代后蜀砖室墓M23、M24，M23墓主人刘塘下葬于后蜀广政十九年（956年）（《文物》第7期）。

2016年，俄罗斯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墓地清理52座墓葬，时代初定为公元8~9世纪，正是靺鞨文化特洛伊茨基类型的形成时期（俄罗斯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乌斯季·伊万诺夫卡靺鞨墓葬2016年考古发掘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 跨前述时段的墓地

2015~201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省敦煌市五墩乡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清理曹魏墓2座、隋墓1座、唐墓5座。其中曹魏、隋代墓葬均有明确纪年，为河西地区该时期墓葬特点判断、分期断代提供了可资对照的标本（《文物》第9期）。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墓地分别发掘墓葬36、42、82座，年代为魏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滕州市博物馆在山东省滕州市羊庄镇前台墓地清理北朝至隋代墓葬42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201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襄阳卞营墓地发掘南朝墓1座、隋唐墓3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淮安市博物馆在江苏淮安金湖西安村墓地发掘南朝墓葬

1 座、唐墓 2 座（《考古与文物》第 2 期）。2016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汉寿县聂家桥乡大岭上清理 3 座砖室墓，其中 M1 和 M2 的墓砖铭文中有关东晋“咸康三年”纪年，M3 属隋代墓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 14 集，科学出版社）。

（二）综合研究

1. 魏晋南北朝墓葬研究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 M1 的发掘为发现曹魏帝陵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有一组论文专门对该墓进行了研究。李零将该墓出土的石牌铭文初步分为饮食、衣服、起居、骑乘、佩剑、佩饰、礼乐、文房、游戏、海贝、树木、骨殖、其他，共计十三类，并做释文和简注。曹锦言分析石牌铭文所记一些随葬品为天子所用，认为该墓应是曹魏帝陵。赵超通过对石牌所记随葬器物名称的释读分析，发现以妇女用品占绝大多数，认为主要墓主人应为女性，支持主要墓主人是公主曹淑并祔葬与之冥婚的甄黄这一看法。霍宏伟通过对石牌铭文所记镜鉴的考证，推断墓主人身份应在魏武王曹操与壮侯曹休之间。刘连香综合分析了西朱村 M1 的墓葬形制、规模和出土随葬品等，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曹操次子曹彰，并非高平陵祔葬墓（以上五文均见《博物院》第 5 期）。

葛彦认为东汉魏晋墓葬出土的青铜或陶瓷质神兽形口衔耳杯器，当属一种灯具，可同时作油灯与烛台用，在墓葬中亦可发挥一定的祭祀功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5 期）。金子典正整理三国至西晋时期神亭壶的研究概况，侧重于对装饰主题中佛像形制的研究，探讨早期佛像的成立背景，认为神亭壶所见佛像表现的是莲花化生图像（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 26 辑，三秦出版社）。郭物论证新疆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所谓“护膊”的丝绸制品可能是一种标示性的“臂章”，是体现汉晋中央王朝统治西域诸国的一种政治信物（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付龙腾、李文成将西晋十六国墓葬中的酱釉小罐分成三型，讨论每型的分布区域、流行时代、产地和传播方式，认为其用途为盛放化妆用品（《东南文化》第 2 期）。

李明认为云南昭通东晋霍承嗣墓是用于招魂的改葬墓，通过对壁画象征性的分析，以及“灵座”存在的设想，推测整个墓室暗示了墓主灵魂的“二重”旅行以及转变过程（《四川文物》第 4 期）。潘玲认为西安洪庆原梁猛墓出土的具有前燕风格的器物，最有可能是 370 年前秦灭前燕后，大批前燕遗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后出现的，年代下限大致在 394 年前秦灭亡或稍晚（《草原文物》第 2 期）。1915 年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十六国时期的 Ast. vi. 4 号墓中发现两件侍女木俑，其上所绘的服装样式和图案清晰可见；王乐、朱桐莹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女俑穿着服饰为晋十六国时期的典型款式，并推断出女俑上衣、裙装的形制以及面料染缬图案的制作，还进行了图像上的复原（《考古与文物》第 2 期）。邓天珍等通过生物切片方法确定了甘肃玉门花海毕家滩十六国时期《晋律注》棺板木材的种类为云杉木，并对其进行了保护修复（《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 3 期）。

南京石子冈 M5 南朝砖印壁画的发现，再次引起学者们对南朝墓葬画像砖的关注。耿朔、杨曼宁以南京石子冈南朝墓 M5 墓砖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墓葬材料，以七贤砖画为重点，尝试对 M5 所出的画像砖进行复原与比较，分析这批砖的种类和原状，进而讨论砖印壁画的制作和砌筑过程（《考古》第 4 期）。赵俊杰、崔雅博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



所出较为完整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为底本，将南京石子冈 M5 中散乱砌筑的同类题材墓砖与其他关联题材墓砖进行复位拼对，分析拼砌方式和规律，并推定该墓的年代和等级（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又见《美术研究》第 6 期）。左骏、张长东以丹阳鹤仙坳南齐大墓为例，解读南朝帝陵中拼砌砖画的制作及墓葬的营建，并分析画面在墓室中的分布规律及其所呈现的空间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7 期）。

大同市博物馆编《熠彩千年：大同地区墓葬壁画》（科学出版社）系统展示了大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墓室壁画的发展概貌、历史价值及其艺术成就，时代涉及北魏、辽、金、元四个时期，其中有 5 座北魏壁画墓。侯亮亮等通过对大同水泊寺北魏墓群出土人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在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不同性别对食物资源的获取上却没有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反映不出北魏女性地位上升的情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编：《边疆考古研究》第 26 辑，科学出版社）。徐津比较了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北魏孝子石棺床上孝子故事在围屏上的次序与它们在日本藏阳明文库本六朝《孝子传》中的顺序，发现孝子图像并不完全遵从文献中的顺序，而是按照“事生”“事死”原则重新组合，并推测这种重组很可能体现了墓葬设计中的阴阳观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10 期）。林圣智《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一书以北魏墓葬资料为主体，考察图像与装饰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交互作用，由四个层面考察北朝墓葬图像中所牵涉的生死表象，分别是“图像制作”“空间结构”“丧葬礼仪”“政治社会脉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图像、装饰、佛教因素三个角度来考察以北魏平城时期为主的墓葬图像，下编是以石床围屏为主体的系列研究。

郭晓兰认为榻是一种产生于东汉晚期，使用时间几乎贯穿魏晋六朝的重要饮食用具，也是当时墓葬祭祀用具的一种；方形榻主要流行于东吴和西晋时期，东晋、南朝时期传统的圆形榻占据主流，至南朝末年逐渐消失（《南方文物》第 1 期）。权弼成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葬出土的帷帐形制及位置，认为帷帐对墓葬空间的构建使单室墓的空间变得更为复杂，帷帐在墓葬空间中由单独设立转变为依附于墓棺存在，表明帷帐的空间独立性下降，这可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内祭祀行为的衰退有关（《文博》第 6 期）。韩茗认为六朝铜弩机是具备实用功能的随葬用品，对其形制、功能及铭文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了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5 期）。韦正、乔苏婷将徐州地区南北朝陶俑特点的转变和演化分为东晋刘宋、北魏和北齐三个阶段，并指出陶俑形象的转变与徐州在南北朝时期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存在紧密关联（《东南文化》第 6 期）。耿朔通过对建康、襄阳、洛阳等地陵墓石刻种类和造型的比较，指出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襄阳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与洛阳有内在联系；西晋末期永嘉南迁之后，寄居襄阳的北方大族在丧葬制度方面可能保留了洛阳传统；至 5 世纪中期，宋孝武帝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源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提升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美术研究》第 1 期）。

付龙腾通过对山东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墓葬装饰进行分析，分辨出汉代因素、南方因素、本地新兴因素、北方政权中心地区因素等对该地区墓葬文化的影响，并探讨各阶段各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演变趋势（《西部考古》第 17 辑，科学出版社）。马啟亮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将广东两晋南朝墓葬分为西晋至东晋早期、东晋中期至刘宋早期、刘宋中期至南朝末三期，并对分期的历史背景进

行探讨（《文博》第1期）。

赵春兰、韦正对南北朝墓葬中佛教因素的表现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南方社会从刘宋开始的快速世俗化进程促使佛教因素大量进入墓葬，而北方地区固有的葬俗和对现世功德的追求，使佛教因素没有能够深入墓葬之中（《四川文物》第2期）。宋丙玲探讨了南北朝墓葬中所见佛塔之影响，如阁维立塔、墓上立塔、墓壁饰塔等（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

李杰《立象尽意：魏晋南北朝平面图像的美术考古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的区域、风格、继承和发展等进行考察，总结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风格演变趋势和特点。韦正《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为作者有关魏晋南北朝画像砖墓、壁画墓的专题性论文集，讨论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交流、传播现象。王希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以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的乐舞、乐器图像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音乐考古资料全面整理、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公元4~7世纪的东亚音乐历史视野中进行探讨。

2. 隋唐五代墓葬研究

帝陵方面，朱超龙认为吴公台隋炀帝陵即雷塘炀帝陵，其在唐武德五年的改葬是在原地进行，贞观年间的改葬为迁葬（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9辑，三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成功揭示了隋炀帝萧后冠头箍结构、博鬓、花树数量与分布，以及铜钗、钿花等饰件制作工艺，完成了对萧后冠的仿制工作，为隋唐时期礼冠制度及其复原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技术资料。田有前通过对唐永康陵和兴宁陵神道石刻特征的分析，认为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并非同时设置，独角兽和石狮可能设置于唐初武德时期，石柱、石马和石人则可能晚至玄宗时期（《考古与文物》第5期）。唐定陵陵园一尊残缺的蕃酋像背部题刻“金义让”，田有前推测其为唐中宗时期的新罗遣唐使金思让（《北方文物》第1期）。甄刚等为控制唐顺陵走狮风化程度，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建立走狮分析模型，对走狮在太阳辐射下的温度场进行计算，探究走狮温度场的分布规律（《文博》第1期）。

在墓葬形制方面，徐斐宏分析关中地区唐代双室墓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咸阳苏君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刘礼堂、陆晗昱在分析东汉至六朝流行于峡江地区，并绵延至唐代的家族共穴合葬墓来源及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峡江地区“借室为墓”葬俗的形成与发展（《江汉考古》第1期）。

在墓葬随葬品方面，董亚梅对安阳隋张盛墓所出佛教用具进行分类、甄别，考证其名称与用途（《中原文物》第4期）。杨瑾梳理了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资料，探析其类型、分布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考古与文物》第6期）。何月馨对考古出土的唐代臂钏和指环作了全面梳理，在形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使用状况、分布地域、等级特征和文化内涵（《文博》第2期）。杜玥将《大唐新语》中所载的随葬铁牛铁猪的丧葬之法与出土铁牛铁猪唐墓的考古资料进行对比，对铁牛铁猪的性质与形象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博物馆研究》第3期）。韩朝会通过三门峡庙底沟唐墓出土塔罐、无系罐、双系罐、盘口壶的类型学研究，排出这四种陶器的演变序列，将庙底沟唐墓分为八期，鼎盛期在唐末、五代（《华夏考古》第3期）。徐斐宏考察了唐初黄釉俑的流布与产地，认为此类陶俑产自洛阳，与安阳隋代瓷俑联系密切，进而指出洛阳唐初墓葬在随葬品与形制方面均可见对北齐以来关东地区墓葬文化的继承（《中原文物》第2期）。刘仕毅考证前蜀

永陵棺床石刻的4件鼓类乐器，认为东一为杖鼓，东二为杖鼓或札鼓，东三为正腰鼓，东十为和腰鼓（《四川文物》第5期）。闫佳楠通过探讨成都后蜀赵廷隐墓出土乐舞伎陶俑的乐器组合、服饰造型，结合唐宋时期相关音乐考古、文献材料，梳理了乐舞伎俑的性质及历史演变（《文博》第5期）。刘彦琪等在修复沧州青县唐墓出土漆盘残片的过程中，确认明代文献中记录的木胎车削技术在唐代的木器加工中就已使用，并以此为基础选择合理的修复材料和方法（《文物春秋》第4期）。

在墓葬壁画方面，有的讨论题材内容与布局。葛承雍分析了唐墓中猎鹰壁画的特征及其反映的社会风尚（《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贺西林分析了唐燕妃墓、李勣夫妇墓屏风壁画的视觉传统和时代特征，肯定了屏风为列女题材，并考察壁画的绘制意图，阐明了其兼具道德与政治双重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2期）。赵晶判断西安市南郊金浮沱村唐代壁画墓的年代为开元天宝年间，并讨论了墓室北壁东侧壁画的内容会在整体布局固定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原因（《考古与文物》第1期）。有的讨论壁画绘制过程。郑岩将唐代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绘制过程分为前后密切相继、一次性完成的五期（《文物》第1期）。王伟等对太原唐代赫连山墓、赫连简墓壁画的绘制、描润与配置进行探讨，提出将太原地区唐代墓葬壁画布局和配置模式命名为“太原模式”（《文物》第8期）。还有的研究壁画的颜料成分与保护技术。严静等在考古现场对唐韩休墓壁画进行全面科学记录和快速无损分析检测，分析了制作工艺、绘画颜料和病害等（《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郭瑞等对西安南郊4座唐代壁画墓的黄色颜料进行科技分析，推测所使用的黄色颜料可能均为就地取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6期）。朱金萌等在实验室和考古现场使用纳米氢氧化钙对唐墓壁画残块进行加固，重点研究了自制纳米氢氧化钙在壁画中的渗透性以及加固前后的色差、孔隙率、强度的变化（《考古与文物》第2期）。

还有一些综合墓葬多方面特征进行的研究。韩金秋对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的形制、仿木构和椁室、壁画与同时代或更早的资料作对比分析，认为崔氏墓的形制不出河北中北部圆形砖室墓规制，只是规模、装饰等方面有所差异；椁室、壁画的文化因素均可在当地或更早资料中找到源头，意味着崔氏墓更多地继承了当地此前的文化因素；水墨山水画、斜拱、折枝花、服饰等均为首次发现，具有填补空白、承唐启宋的重要意义；形制奇特的椁室可能源于对方形覆钵式塔的仿造，反映了唐末佛教对平民阶层社会生活的影响（《文物》第6期）。林思雨分析中原北方五代墓葬的类型和渊源，认为其最显著的意义是具有桥梁作用，装饰题材上抓取了唐墓要素，又将其大大简化、生活化，表现内容从宫廷仪仗转向内宅生活，砖雕仿木构、妇人启门、伎乐奉侍、门窗家具这些宋墓常见的装饰要素已齐备；使用身份从唐代的皇亲国戚下探到地方节度使、高级官僚，为北宋进一步下探到富民阶层做了过渡（《华夏考古》第6期）。谭重言等结合墓葬壁画、陶俑资料和文献记载，考证胡服与女着男装流行于唐代前期，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少，探究唐代前期女性服饰及其社会活动的动态变化，揭示唐代服饰风尚所反映的“女性地位”“女性意识”（《文博》第4期）。杭侃结合文献和石窟壁画、墓葬砖雕、随葬品等考古资料，认为椅子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区武将人群所使用，并随着河北政治集团成员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响而扩展，进而被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李瑞哲通过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都兰吐蕃墓地出土文物等考古发现，探讨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踪迹（《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3. 跨上述时段的墓葬研究

李梅田、李童认为中古招魂葬之俗始终以先秦以来的魂魄二元观为思想基础，大致出现于汉代，而盛行于东晋，唐代更为普遍，以特殊方式体现了墓葬的藏形和安魂功能（《江汉考古》第4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滕州前台北朝至隋代墓地采集的31例人骨标本进行鉴定，结果是男性死亡年龄集中于中年期，女性死亡年龄则集中于青年期和壮年期；并认为前台居民存在牙釉质发育不全和多孔性骨肥厚现象，可能与其生存压力及饮食结构有关（《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卢亚辉对北朝至元代墓葬中所出伏听进行考古类型学与分区分期研究，认为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徙有关，与中古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国，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僚化，五代北方人口的南迁紧密相连（《文博》第5期）。

郑旭东通过对西安曲江晚唐崔氏墓、韩家湾唐墓 M29 资料的整理，结合关中等地区晚唐至宋代墓葬资料，认为唐宋过渡时期关中墓葬文化的特征是以本土晚唐墓的关中模式为主体，少量吸收东部的河北模式（《西部考古》第18辑，科学出版社）。

三 手工业遗存发现与研究

在建筑材料方面，王飞峰根据莲花化生童子及其周围纹饰的变化将北魏莲花化生瓦当分为四型，认为此类瓦当可能产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时期，一直沿用到北魏灭亡，主要用于北魏宫室、皇家寺庙等高等级建筑（《四川文物》第3期）。胡强对邳南城东魏北齐宫城釉陶瓦的种类、制作工艺、管理制度和渊源作了探讨（《文物世界》第1期）。吕梦以包括平城、洛阳、邳城、长安在内的北朝隋唐时代主要城市遗址出土的文字瓦为中心，从文字内容和施印方法两个角度入手，分析瓦上铭文的变化规律，认为其变化的关节点可能在东魏北齐（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王子奇梳理了北朝隋唐鸱尾发展演变的几个节点，探讨了鸱尾向鸱吻的转化（《北方文物》第1期）。

在陶瓷考古方面，李鑫通过对制瓷原料与胎釉工艺两方面的分析，探讨隋唐五代时期制瓷技术的革新与流动对白瓷生产的影响（《南方文物》第5期）。郑建明对21世纪以来唐代高温加彩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文物天地》第1期）。张琴依据模具及模印器物的出土情况，认为邛窑模印工艺兴盛于晚唐时期的十方堂窑址，并不断丰富，延续到宋代；其模印工艺不仅吸收了本地的陶瓷传统，还受到唐代金银器生产工艺的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2期）。

另外，谢明良的陶瓷史著作在大陆集中出版，《六朝陶瓷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采取分区研究的方法，分为江苏、福建、江西、北方几个主要区域，讨论其造型、装饰、组合、材质和制作工艺等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六朝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国陶瓷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探讨了山西唐墓出土陶瓷、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等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探讨了日本出土唐三彩、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黑石号”沉船中的中国晚唐陶瓷器等问题。



四 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一) 考古发掘与调查

1. 石窟与寺院

张焯等编《云冈石窟全集》(20册)(青岛出版社)收录造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用图12710张,全面展示了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是迄今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寺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时代主要是北魏和辽金时期;发掘北魏至辽金时期塔基一座,塔基中心平面近方形,具有北魏风格,塔基外围平面为正八角形,时代属于辽金时期;铸造场地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系,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以及辽金琉璃瓦和建筑构件等,都具有鲜明的辽代特征(《考古学报》第1期)。

常青对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进行初步调查,探讨其开凿年代、造像题材、石窟形制等问题(《文物》第2期)。冉万里等在西安西白庙村南即唐长安城延康坊西明寺遗址所在范围发现一批唐代善业泥,其图像题材可以分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和施说法印的佛像、菩萨像、药师佛像、地藏菩萨像、燃灯供养菩萨像等六大类,以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的佛像为主,为研究唐代西明寺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与文物》第1期)。

2010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对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西寺14座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从形制、壁画等特点,考证西寺石窟的年代为3~8世纪;又对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3座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考证其年代为7~8世纪(《西部考古》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对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IVFD3进行发掘,推测该佛殿建筑的年代在6~8世纪(《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2. 造像

张敏、杨军经详细调查,对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永宁镇新发现的6处北魏至初唐的摩崖造像龛群进行介绍,并讨论窟龛时代、造像题材、分期特点等(《敦煌研究》第2期)。2012年,延安市洛川县博物馆、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对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境内洛河和沮河流域摩崖造像进行调查,详细介绍了黄陵县境内北朝5处、唐代1处、宋代1处共7处摩崖造像的资料,并讨论造像时代、地域分布特点等(《洛阳考古》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科学出版社)一书为河北省临漳县北吴庄北朝至隋唐佛教造像埋藏坑的阶段性整理成果,以图录的形式公布了131件造像。2015年,河北定州开元寺塔东北发现北齐白石造像残件1件;同年,定州静志寺塔地宫西南发现白石造像坑一处,出土造像残件249件,主要为东魏北齐时期,亦有少量隋唐时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这两次出土的资料进行整理,选取9件有纪年的造像以及7件北齐至隋特征的造像予以介绍(《文物》第9期)。

2016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博白县博物馆对广西博白县宴石山宗教遗存进行调查和三维扫描,初步断定宴石山摩崖造像的雕凿年代可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明显受到桂林西山摩崖造像的影响(《文物》第9期)。临胸县文化和旅游局对山东临胸石门坊两处摩崖造像群及摩崖题刻、碑碣、瘞葬龛、墓塔等佛教

文物情况进行介绍,判断其年代主要集中在唐天宝年间至乾元年间(《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仁寿县文物管理所对四川省仁寿县鳌陵乡黑龙寺摩崖造像进行调查和记录,依据龕形、造像组合、造像题材推断黑龙寺摩崖造像开凿时代为中晚唐时期(《敦煌研究》第4期)。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西藏芒康县朗巴郎增拉康建筑布局、早期建筑材料、石雕佛教造像及附近的古藏文石刻进行调查,考证其时代在815~83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

李东、阳跃华详细记录了广西桂林龙泉寺区域唐五代造像遗址的面貌、遗迹遗存、墓葬、井泉、寺庙器具和不同时期摩崖造像、碑刻的内容、形制、尺寸比例、保存状况等,为研究桂林西山唐代佛教造像的承接关系及岭南佛教传播渊源提供了新材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2期)。2017年以来,都江堰市文物局对四川都江堰市三佛洞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第1、2、3三龕年代为晚唐五代时期(《四川文物》第3期)。2014年,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对四川安岳县来凤乡圣泉寺摩崖造像进行了系统调查,认为该处造像开凿于前后蜀时期(《敦煌研究》第5期)。赖天兵对杭州九曜山窟龕造像进行调查,认为1、2号造像龕的年代为五代吴越国,3号龕的年代为北宋(《文博》第3期)。

(二) 综合研究

1. 十六国时期

董广强从历史背景、洞窟组合、形制规律等方面对夏朗云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姚秦五窟”说提出质疑(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

张善庆对甘肃省张掖市金塔寺石窟北凉时期东窟中心塔柱东向面中栏近乎裸体的人物造像进行考证,认为她并非过去所定名的菩萨,而应是魔女,整个造像组合为释迦牟尼佛降魔成道(《敦煌学辑刊》第1期)。

张文元等应用多种移动式分析设备,对甘肃天梯山石窟北凉洞窟壁画残块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确定壁画使用了16种颜料,其中两种属于首次发现(《敦煌研究》第4期)。

2. 南北朝时期

王友奎对大同云冈第5、6窟图像构成的内容和佛教思想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敦煌研究》第3期)。因幡聪美分析了云冈石窟第7、8窟的设计要素,讨论了云冈二期双窟的设计目的和设计计划。八木春生对云冈石窟第13窟的主尊、明窗、各壁面的造像进行详细分析,考察该石窟的营造顺序,以及第13窟与第11、12窟造像之间的关系。付有旭等针对云冈石窟第13窟壁画泥塑的病害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修复措施和建议(以上三文均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九辑,科学出版社)。

张雪芬从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骑象菩萨”入手,对南北朝时期“普贤骑象”造像进行梳理,认为在窟龕造像中,与普贤对应的题材极为丰富,普贤、文殊组合的出现时间在北魏迁都前后(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孙晓峰对麦积山北魏晚期第142窟正壁的泥塑动物形象进行考辨,认为它们不是佛教瑞像或佛传故事,而是白象、猕猴、鸚鸟自分长幼的本生故事(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



《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杨文博对麦积山石窟北魏晚期螺髻造像的身份做进一步探究，认为其身份为弟子，表现的是弟子在听释迦牟尼讲授《妙法莲华经》的场景(《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刘连香以龙门石窟古阳洞北魏广川王国造像所在位置、布局和题记内容为基础，将广川王国造像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下考量，结合墓志资料，综合探讨造像人群与所开窟龕之间的关系、窟龕布局的规律性以及四代广川王所经历的事件(《敦煌研究》第4期)。张雪芬讨论了龙门古阳洞北魏杨大眼龕龕楣被破坏的时间及历史背景，分析了龕楣的造像题材，认为其中“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组合图像是现存时代最早的该题材造像实例(《华夏考古》第5期)。

贾敏峰介绍了河北定州市博物馆藏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定州刺史庾狄干造像残件的资料，并考证庾狄干的生平事迹、庾狄干造像的背景、庾狄家族成员、东魏僧官制度等问题(《文物》第2期)。何利群认为北朝晚期因末法思想泛滥，石窟和摩崖刻经在中原北方地区极度盛行，并在北齐境内形成了邺下和泰山两大中心，而且邺下僧人及北齐刻经对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陕西金川湾三阶教刻经及四川地区唐代刻经的出现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华夏考古》第6期)。周麟麟等对山东青州龙兴寺北齐24号菩萨立像进行虚拟复原和色彩重建，并开展以文物复原初貌为目标的古代服装复原研究(《中原文物》第1期)。

张元林从《法华经》角度出发，对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内容做系统解读，认为它们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华经》的“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观和“佛寿久远”“佛身久远”的佛身观，而它们的功能就是为了营造“法华三昧禅”的禅修氛围(《敦煌研究》第2期)。常青考察了西魏长安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上石窟遗迹的关系，认为西魏首都长安的佛教造像既有新风格，又有旧传统，但真正能体现西魏佛教艺术最高成就的彩塑与壁画作品，保存在天水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中；西魏还开启了北周典型造像样式的先河(《美术研究》第1期)。张萍、马千探讨了麦积山石窟藏北周“吕景文寺”石雕造像碑的碑文内容、碑刻样式、造像风格，以及该碑所反映的多民族杂居、多宗教信仰等问题；张铭对甘肃天水武山水帘洞石窟千佛洞北周说法图进行考释，探讨榜题所反映的北周府兵制问题(以上二文均见《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王艳、魏文斌对甘肃省博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各藏的一件北周天和四年夏侯纯陀佛教造像碑进行研究，探讨造像者身份、造像组合形式与信仰，总结北周天和时期造像的风格特征，考证二者的来源地应为渭北耀县一带(《敦煌研究》第6期)。董华锋认为成都万佛寺出土“天和二年”铭菩萨像本身的年代确实为北周，但台座背面的题记并非“天和二年”，而是唐代“元和二年”对造像进行修补后重刻的，并认为成都的北周菩萨像糅合了长安样式与本地传统等双重因素，呈现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北周造像风格(《敦煌学辑刊》第2期)。

付卫杰通过排比青州地区北朝晚期背屏式造像，梳理、总结其形式的发展演变规律，推定青州七级寺遗址出土的一件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的时代为北魏末至东魏初年(《敦煌研究》第1期)。刘文涛、姬凌飞对山西高平市高庙山石窟北朝晚期礼佛胡商图的内容进行分析，并讨论其出现的原因(《文物世界》第3期)。卫玉敏通过对山西运城博物馆展示的几件北朝时期造像碑材料的综合分析，认为运城与毗邻的周边省区相比，佛教传播与发展相对滞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造像艺术和样式上主要受关中及豫西地区影响(《文物世界》第4期)。陈菊霞考证莫高窟北朝晚期第246窟四壁的千佛是依据敦煌分卷

本《佛说贤劫千佛名经》而绘制，中心柱塑像意在表达十方三世思想，甬道绘十地菩萨；这些题材与敦煌文献中的一些《菩萨戒牒》所奉请的“三师七证”相符（《敦煌研究》第3期）。樊雪崧、殷博分析了敦煌西千佛洞北朝第8窟涅槃图中几个主要画面的元素，认为其应受到以《长阿含经·游行经》为主的阿含系涅槃经典的影响（《敦煌研究》第5期）。

陈兆镜将南朝齐梁时期佛教造像分为两类五型，以梁普通年间为界分为早、晚两期，并分析了“齐梁风格”的形成及传播（《四川文物》第5期）。邓新航、龙红以近年四川考古新发现的南朝观音造像为中心，对蜀地南朝观音信仰流行的原因、“观音成佛”造像的实质、观音造像的艺术特征演变及其渊源等作初步探析（《四川文物》第3期）。

王治对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梁石刻造像碑、麦积山西魏初第127窟西壁经变、南响堂北齐第一窟西壁上方和第二窟原西壁窟门上方浮雕经变进行甄别研究，以探讨中国早期西方净土变造像的起源，将净土世界的刻画内容及表达方式作为行文主线，再密切结合南北朝时期无量寿信仰的基本状况，对上述造像重新加以检视，作整体解析，并讨论其所受弥陀净土义学的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

3. 隋唐五代时期

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成果最多。樊雪崧根据壁画榜题痕迹，对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19窟须大拏本生图中约50处情节进行重新整理，认为该图像中普遍缺失“布施妻子”的画面，应是石窟营造者在引入外来佛教文化时为避免某些可能发生的观念冲突而舍弃所致（《敦煌研究》第1期）。陈振旺认为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具有鲜明的外来性和过渡性，新样迭出，构图新奇，色彩风格多变，向具有现实生活审美趣味的植物纹样主题演变，开始形成以植物为主题的中国装饰纹样体系（《敦煌学辑刊》第2期）。滨田瑞美以日本奈良时代的维摩诘经变为线索，探讨敦煌初唐时期维摩诘经变的配置问题，及其与周围图像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杨效俊认为开凿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莫高窟第332窟是武周时期新出现的“原创性”洞窟，其建筑与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是武周时期兴盛的佛舍利崇拜，是在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考古与文物》第4期）。张景峰对敦煌莫高窟唐代第217、31窟两铺早期的金刚经变进行考察，探讨敦煌石窟金刚经变最初出现的样式及发展形态，认为其在形成之初表现手法就非常成熟，可能是受到其他经变如净土经变的影响（《敦煌学辑刊》第2期）。陈庆俊从榜题、发愿文和图像特征几个方面探讨敦煌莫高窟唐代第220窟“新样文殊图”中东侧胁侍菩萨的身份，并探究“新样文殊图”的政治意义（《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杨效俊从唐代莫高窟李氏家族所供养的第332、148窟的三通功德碑入手，解读李氏家族所营建石窟的内容和主题、建筑及图像程序，分析李氏家族造像窟如何在王权、佛法、家族等力量的综合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敦煌地域特征的宗教空间（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魏健鹏认为莫高窟晚唐第9窟的营建思想是净土往生思想，并探讨了吐蕃遗民参与洞窟营建的可能性（《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王惠民利用新完成的敦煌莫高窟五代第72窟北壁弥勒经变数字化图像，对该经变进行细致考察，首次完整抄录该经变的榜题文字，并与经文、画面进行比对，发现该经变主要依据义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绘制（《敦煌研究》第4期）。崔岩、杨建军通过对敦煌五代时期僧尼供养像服饰的概况简述和个案分析，阐明此时期僧尼服饰

所反映的佛教传统和世俗化倾向（《敦煌研究》第5期）。

龟兹石窟方面，刘韬对库木吐喇唐代第14窟主室正壁弥勒经变壁画进行识读，认为弥勒信仰曾是流行于龟兹地区唐风洞窟的主要信仰之一，弥勒佛交脚坐姿形象应受到龟兹本地或西来影响，弥勒经变壁画的图本来源在汉地东来基础上加入了胡化风尚（《敦煌研究》第1期）。克孜尔石窟第189窟的壁画绘成于公元7世纪左右，周智波等对该窟脱落的蓝色壁画颜料进行科技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为青金石，胶结材料为植物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龟兹石窟“如来留钵”“佛陀举山”图像集中出现于克孜尔石窟的繁盛期（公元6~7世纪），到回鹘时期的石窟壁画中还绘有相关图像，杨波对这两种题材的图像组合进行了梳理和意义考证（《西域研究》第4期）。李瑞哲认为龟兹回鹘风格的石窟是9世纪回鹘西迁龟兹后接受汉地文化而形成的，佛教教义方面受到龟兹佛教与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来自中原佛教思想的影响，大乘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影响较深，出现了地狱变的题材（《敦煌研究》第5期）。

关中地区佛教寺院出土遗物方面，杨涛、李孜宣通过对长安兴教寺石刻《捣练图》中人物服饰、发式及艺术风格的分期对比，将石刻年代定为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捣练图》石槽的主人应是唐宰相韦安石（《四川文物》第4期）。常青论述了唐长安城大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十一尊密教石雕像的佛典依据、雕刻年代以及在原寺殿堂中的配置情况，认为它们的制作时代当为开元、天宝年间，被毁坏弃埋的时间为唐武宗灭佛之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0期）。陈锦航提出对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器具进行分类，不仅应基于文物的特征、材质与功能，还应当考虑到物体现的社会关系；认为法门寺的茶器具之所以是不成套的，原因在于唐朝政府与佛教的关系是“恩赐”而不是“供养”（《农业考古》第2期）。

河南地区石窟和佛教遗物方面，彭明浩认为龙门西山南端两处未完成的石窟工程保留了斩山施工的遗迹，揭示出唐代斩山工程的基本工序；同时，斩山遗迹的位置、规模以及壁面上后期补凿的小型窟龕，也反映出工程停工与中宗复位诛杀武氏亲党的时代背景有关（《华夏考古》第5期）。彭明浩还在对巩义石窟窟檐建筑遗迹调查测绘的基础上，认为窟檐很可能与唐初补凿的龕像同时施工（《文物》第12期）。韩建华对唐代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的大和九年（835年）陀罗尼经幢所刻两部咒语的版本进行探讨，认为白居易宅院的《大悲心陀罗尼经》采用的是七十八句的咒本，是比较早的版本（《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山西、河北地区石窟、造像方面，李裕群根据法国人吉恩·拉蒂格（Jean Lartigue）1923年考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时拍摄的一组旧图片，对天龙山东峰上层第3窟造像进行复位考证，考察部分造像的去向，认为该洞窟开凿于唐代，并讨论其所反映的唐代造像题材等问题（《文物》第7期）。梁育军、韩利忠介绍了山西孟县上文村摩崖造像资料，现存唐高宗时期摩崖造像13组24龕，以及题记十品，造像以单体佛造像为主，应属于净土宗信仰的遗迹（《文物世界》第3期）。朱己祥对河北赞皇县治平寺唐开元二十八年造像塔的图像和铭文内容进行了阐释（《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西南地区石窟、造像方面，孙延忠等利用体视显微分析、金相显微分析、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技术对四川广元千佛崖唐代武则天时期莲花洞彩绘颜料进行物相和成分分析，确认彩绘颜料层有叠加现象，推测历史上可能对造像彩绘进行过修复或重绘（《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2期）。董华锋以四川巴中南龕晚唐李思弘重妆龕像为例探讨石窟寺重妆现

象,进一步揭示出李思弘这样一个唐代下级武官的信仰及其仕途、家族等一系列不同于初始面貌的新内涵(《敦煌研究》第5期)。李冠畿在四川内江新发现普陀岩、圣水寺两处晚唐五代前后的摩崖浮雕观音救难图像,认为二者选择的经文情节、艺术表现与当时汉文化地区流行的同类图像相近(《敦煌研究》第6期)。夏格旺堆对西藏察雅县仁达摩崖造像周围的石刻文字进行调查,考证造像的雕凿年代应为804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造像、佛塔方面,常青考证杭州凤凰山胜果寺的摩崖西方三圣像龕完工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由吴越国王钱鏐出资建造;位于胜果寺废址上的十八罗汉像极可能是由普通官吏或平民僧俗信徒出资雕造,是迄今为止极少见到的五代时期的十八罗汉像(《敦煌研究》第4期)。常青还对杭州净慈寺后慧日峰上石佛洞与无名洞造像的年代、风格与题材进行论述,认为它们应为五代吴越国净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博》第2期)。赖天兵系统分析了吴越国石刻佛教造像的造型及其尊像组合,归纳造像特征,认为当时杭州流行着一种具有地域性、时代性的佛教造像样式,即“杭州样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九辑,科学出版社)。任平山结合克孜尔及敦煌石窟壁画,对浙江、江苏等地所出“吴越阿育王塔”塔身四面的四种佛本生故事图的内容重新释读,认为四种图像中两种识别正确,另两种被古人误读(《文物》第3期)。冉万里考证了南京栖霞寺五代时期舍利塔上的佛传故事,认为这一做法与晚唐五代时期佛传故事的重新兴起有着密切关系(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6辑,三秦出版社)。

4. 跨上述时段

龟兹石窟中,梵天劝请题材大约产生于公元5世纪,一直延续至回鹘时代。杨波全面收集龟兹石窟壁画中关于梵天劝请的图像,并探讨其构图模式、经典依据、图像来源等(《敦煌研究》第3期)。冉万里对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调查与发掘的收获作初步总结与论述,获得了一批关于遗址的新数据,探讨了食杂三净、塔葬与瘞窟、“塔殿横置”的寺院布局、寺中有寺的寺院群构成等问题,并将佛寺遗址分为三期:西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至隋代、唐代(《西部考古》第18辑,科学出版社)。林立根据石窟形制和壁画题材、风格,将现存高昌早期石窟分为三期:北凉至高昌国前期、魏氏高昌王国时期、唐西州时期,这些早期石窟受到龟兹石窟的影响,同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对敦煌石窟有影响(《文博》第3期)。张晓彤《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一书对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保存现状进行调查与评估,探讨壁画保存环境、制作工艺和材料,分析壁画病害原因,通过一系列修复试验完成了对壁画的修复,并提出预防性保护建议。

胡同庆《敦煌佛教石窟艺术图像解析》(文物出版社)一书探讨了敦煌石窟的艺术体系、范围界定、题材内容、时代背景、宗教信仰等问题。赵娜冬、段智钧《敦煌莫高窟与6至11世纪佛寺空间布局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书以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形制、经变壁画以及主尊塑像等遗存为研究对象,讨论6~11世纪佛寺院落的空间布局特征,重点关注佛寺院落的殿阁配置、空间关系与空间组合三方面。邵晓峰在探讨唐宋椅子概念演变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壁画中椅子图式的基本状况,着重对初唐莫高窟第334窟壁画《舍利弗宴坐》中的椅子与西魏莫高窟第285窟壁画中的绳床进行全面比较,并对《舍利弗宴坐》中椅子的坐高、坐姿、造型、结构、象征手法以及描绘意图进行图像学描



述、分析与诠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闫增峰等《敦煌莫高窟遗址保护物理环境探索性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针对敦煌莫高窟窟内物理环境的相关问题，主要开展了敦煌莫高窟建筑空间优化、洞窟内微气候测试、壁面材料表面吸放湿过程、洞窟内通风调节与控制、洞窟内光环境、窟区绿化景观微气候调节机理等方面的研究。

陈悦新分析河北出土北朝至隋唐时期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探讨其演变脉络（《文物》第4期）。郑深明对河北博物院收藏的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28件北魏至隋唐时期典型纪年造像作重点介绍，并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该遗址造像中88件有纪年者，将其造像风格分为四期，梳理其艺术风格的演化规律，探讨其风格来源、传播方向和影响（《文物春秋》第3期）。

蒋晓春、雷玉华、聂和平通过纪年石窟材料，将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为四期七段：第一期为南北朝后期，是起源和初步发展阶段；第二期为隋至晚唐，是发展成熟并形成“唐风”的时期，也是该流域石窟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三期为唐末、五代至两宋，在风格上完成了由“唐风”向“宋风”的转型，形成鲜明的宋代风格和地域特征，是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第四期为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是嘉陵江流域石窟造像的衰落期（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2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春认为长安和蜀地都是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地，早期佛教图像都是犍陀罗样式，有可能都是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传入的；北魏时期，北魏佛教造像风格影响了四川盆地北缘的广元地区造像；西魏至北周时期，随着西魏并蜀，大量的益州僧人进入长安，带去了益州南朝造像中的圆雕立像传统；隋至唐初时期，随着长安官员入蜀，“龕”这种造像形式开始在四川流行，盛行于长安的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也传入四川盆地（《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五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

（一）陆上交流

李秋红分析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认为这种纹样在北魏早中期突然以成熟形态出现并流行开来，应为域外传入的文化因素；该纹样公元前5~前4世纪在南欧发展成熟，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向东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入中国并本土化，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故宫博物院院刊》第8期）。葛承雍分析了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腰带和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出土的银腰带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纹饰、工艺一脉相承，均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西方腰带；银腰带可能是贸易品，也可能是贡品和战利品（《文物》第1期）。李静杰具体阐述了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的文化来源，认为这些家具图像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情况，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西域，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罗（《敦煌学辑刊》第3期）。霍巍、霍川将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分为“整体型”“拼合型”“复合型”等类型，认为这些黄金面具和古代中亚、西亚地区流行黄金面具的习俗之间有共性也有特性，但很明显都是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发生相互联系，东西方文明在青藏高原交流与交往，使得青藏高原的黄金面具同时具有东方和西方丧葬习俗的因素（《敦煌学辑刊》第3期）。

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著，李梅田、付承章、吴忧译《粟特银器》（上海古籍出

版社)一书是“中亚考古之父”马尔沙克先生经典力作,作者系统整理了粟特银器的金属细工流派及各流派与亚洲艺术的联系,并对器物背后的历史内涵作出解读,为中国唐代金银器研究提供了参照。付承章进一步考证大同北魏封和突墓银盘中的人物形象、来源、年代等问题,认为银盘人物应与萨珊社会第二等级的王子有关,来源地可能是中亚,可能是3世纪末至4世纪早期的作品(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承章还认为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人物纹银碗可能不是萨珊波斯的制品,而可能产自中亚(《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戴春阳从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的胡商牵驼砖出发,梳理了文献中“胡”“胡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变化、粟特早期历史概况和牵驼胡商的民族属性,以及粟特胡服对唐代中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认为敦煌唐墓模印胡商牵驼砖比敦煌壁画更贴近丝路胡商的真实生活场景(《敦煌研究》第5期)。

李崇峰主编《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一书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与犍陀罗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包括李崇峰《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龟兹与犍陀罗的造像组合、题材及布局》《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长阿含经〉等佛典》《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林梅村《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耿剑《从燃灯佛造像看龟兹与犍陀罗的佛教关系》,龚国强《唐朝佛寺中的天竺影响》,李裕群《5~8世纪百济、新罗佛寺的形制及其渊源——兼论中韩佛教寺院的关系》等论文。满盈盈《龟兹石窟艺术元素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以构成龟兹石窟的不同艺术元素为线索,分析犍陀罗、印度、波斯、北方草原、中原各种艺术元素与龟兹的联系、传入的路径,以及在龟兹石窟中图像发生的嬗变和历史文化成因。古正美认为克孜尔石窟有创造支撑信仰新像的效果,而且还将制作造像的方法传播到亚洲各地,并不只是以“佛教东传”的方式传播(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

刘芊对北朝石刻佛教圣树图像的艺术渊源与流变做深入探讨,认为根据艺术特点的差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可见在中亚活跃的游牧民族,以及鲜卑、高句丽艺术的影响,这类圣树图像是北魏统治者内在文化基因与外来文化的糅合;第二类可见古印度艺术的影响;第三类可见南朝艺术的影响;第四类是北朝民众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在各地的新创,体现出中国民众的创造性和不同地区的风格差异性(《美术学报》第4期)。郑燕燕认为塔形器起源于古代印度,原为日用盛器,可盛放香料等物,后被借用为舍利容器;随着中西交往,特别是佛教流布,这类器物逐渐东传,在西域它们仍被用作舍利容器,但在内地则以盛放香料为主,被称为“香宝子”;唐墓中的陶塔式罐造型应该模仿自塔形香宝子,是外来香具或盛器的明器化,最初与舍利、佛塔、超升等并无关系(《美术学报》第1期)。

陈晓露对西域汉晋箱式木棺进行系统梳理,认为其混杂了多种文化因素,既有汉文化因素,亦有西方与汉文化因素的融合,还表现出草原葬俗的影响;这反映出西域不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外来文化因素吸纳、融合、创造,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马艳从探讨北魏大同迎宾大道M70墓主的族属出发,分析了北魏与欧亚草原西部族群方室土洞墓的关联,以及鲜卑至北魏时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西部人群的交流(以上二文均见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海上交流

陈灿平分析了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镜的类型及其流行年代，并与9世纪上半叶唐墓出土铜镜进行比较，认为仿制过时的葡萄镜、花式花鸟镜是唐代外销铜镜中的标志性符号（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克伦通过对“黑石号”沉船出水唐代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唐代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并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

六 墓志与碑刻研究

（一）墓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新入藏墓志的汇编，收录砖、石墓志228种，其中十六国前秦墓志1种、西魏墓志3种、北周墓志5种、隋代墓志5种、唐代墓志及镇墓石131种、五代墓志1种；墓志内容丰富，墓主有著名的上官婉儿、韩休等，对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民族融合、家族关系以及碑刻文字等都具有重大价值。

毛远明编著《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凤凰出版社）一书收录西南大学石刻研究中心2010年以来新藏墓志259通，其中北魏4通、东魏7通、西魏5通、北齐6通、北周12通、隋代13通、唐代209通、后唐1通、后晋1通、后周1通，每通墓志下提供简要信息、释文及相应校释。周晓薇、王其祎《贞石可凭：新见隋代墓志铭疏证》（科学出版社）一书搜集了2008年以后新见隋代墓志163种，对每种墓志从基本信息、志盖志文、疏证三方面进行个案整理与研究；疏证侧重厘清志主的出身、家族、世系、任职、婚姻、子女、宅第、葬地等史料实况，并分析与志主生平事功相关联的史事。

李鸿宾《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中华书局）一书选取高车·拓跋、吐谷浑与粟特三个族群作为个案，结合墓志资料与传世文献，对唐朝外来族群进入中原汉地的活动及其反映的胡汉关系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考索。

另外，关于三国至隋唐五代墓志的论文不下于120篇，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8、29辑（三秦出版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论丛》第24辑（三秦出版社）有集中刊载，其他散见于各种期刊和集刊。墓志考释的内容大部分是探讨墓志主人的家世、履历和所涉的历史事件。有些墓志论文也讨论到其他问题。例如葬俗和礼制方面，焦杰以唐代墓志为核心，讨论唐代多娶制下夫妻二人合葬时，原配与继室之间因同穴权问题而呈现出的矛盾与冲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仇鹿鸣比较了唐萧遇墓志与《通幽记》两个文本对萧遇寻访生母陆氏葬地，先是误掘他人坟茔，最终完成迁葬的事迹的记载，探讨了唐代墓葬的权厝与迁葬，及与之相关的法律、伦理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崔世平对后唐德妃墓志进行考释，由墓志铭中“中朝轨式”的记载探讨德妃的圆形墓葬形制（《考古》第12期）。墓志纹饰方面，沙武田通过对唐粟特后裔郑延昌墓志线刻胡人乐舞图像的考证，认为此图像属中古墓志稀见图样，可归入广泛的墓葬乐舞图，并讨论纹样寓意、乐舞属性、伎乐组合、图像功能等问题，认为该墓志图像属于独

特历史背景下粟特胡人后裔在墓葬文化上的创新，丰富了唐代墓志纹样（《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四辑，商务印书馆）。官制方面，卜天舒对唐代程安墓志所记载的车营军使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所谓车营军是中晚唐时期各藩镇专门负责后勤事务、粮饷转运的一支后勤部队，车营军使则是这支专门部队的指挥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历史地理方面，蒋子谦利用传世文献与墓志，考证东魏北齐邺城实施“县一里”的行政区划，并辅助以“县一部一行一里”的管理区划，总结邺城内外可考的行有6个、坊有10个、里共57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毛阳光结合《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洛阳出土胡俑以及隋唐墓志对祖先洛阳行迹的追述，考证唐《宋彻墓志》和武周《田玄敏夫人李氏墓志》中记载的“胡坊”应渊源于北魏时期在洛河南岸安置西域胡人的慕义里，直到唐代前期，胡坊旧称尚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胡坊村（《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宗教信仰方面，雷闻对《唐景龙观威仪检校修功德使田尊师墓志铭》进行详细考释，志主田儂是杨贵妃受箓的度师，是唐玄宗崇道运动的亲历者，深度参与了当时的许多重要事件，为理解盛唐道教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

（二）碑刻

渠传福对《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重新考证，认为其所记功绩是西晋咸宁二年（276年）胡奋在并州平定鲜卑的事迹，而非征讨南匈奴（《文物》第5期）。杨晓明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历史文献，复原西晋《齐太公吕望表》的完整碑文，并予注解，还论述了相关史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

王庆卫通过对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语陀罗尼经幢刊刻内容的分析，认为其当称作“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唐建中二年（781年）刻立于大兴善寺，其性质和尼泊尔没有关联，而应该与不空碑同属于不空三藏卒后的礼仪纪念碑（《文博》第6期）。王乐庆通过考察西安博物院藏《唐会昌二年（842年）铭经幢》，分析唐代的孝道思想，以及建幢人彭城郡刘氏的族源等问题（《文博》第2期）。

诸城市博物馆公布了山东诸城龙兴寺遗址出土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卢舍那放光碑》的形制、碑文等资料，并考证了佛头、龙兴寺等相关问题（《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郭新明通过对山西晋城青莲寺唐大和七年（833年）碑刻的释读和考证，管窥当时青莲寺佛教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深刻影响（《文物世界》第2期）。

夏吾卡先以吐蕃赤德松赞墓碑的新拓片为基础，结合传世文本资料，重新对勘、补录碑文，更译、论证了前人的译文，考证了传世文本的形成年代与抄写之人（《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